

斗山遗址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斗山村西侧，地处斗山南侧缓坡地带，东北紧靠横山，南临黄泥坝河，整体地势北高南低。斗山遗址北距长江约30公里，南距太湖约25公里，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普遍近2米，核心区厚约4米，主要包含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遗存，是一处规模较大、内涵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

2024年12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考古机构，组建联合考古队，开展工作始终坚持“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协调配合、资料集中”的原则，严格依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执行，确保各项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框架下有序推进。

主要收获

截至目前，斗山遗址已布设探方160个，探沟12条，发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出土遗迹丰富，涵盖马家浜、崧泽、商周及唐至明清等多个时期，其中以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堆积为主体。马家浜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8处、台地1处、墓葬66座、灰坑62个、灰沟5条、墙2道、红烧土堆积8处；崧泽文化时期遗迹有房址2处、墓葬162座、灰坑70个、红烧土堆积2处、灰沟5条；商周时期灰坑48个、灰沟3条，唐宋明清墓葬60座。出土各时期陶器、石器、玉器、瓷器、铜器等文物标本近2000件。

在发掘区西北部，发现并清理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三条壕沟和两道墙体、外墙和壕沟揭示近70米，内墙和壕沟揭示近50米，初步推测存在史前城址的可能。考古队随即对遗址周边进行重点勘探，追踪墙和壕沟的线索，并依据勘探结果先后在遗址西北、北部、东北、东南及南部布设了7条探沟（TG4、TG7、TG8、TG5、TG11、TG12、TG10），均发现有墙和壕沟遗迹。至此，从已有发掘区揭示出的墙和壕沟，结合考古勘探和探沟发掘的情况，可以判断内墙及其外侧壕沟是闭合完整的，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如此闭合完整结构的线性遗迹，应是城址。外墙及其外壕主要是在遗址北半部，南半部分暂未发现，可能已被破坏，需要继续勘探确认。

经过发掘，斗山遗址存在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城址，可能存在内外两重城，内城平面面积约7.5万平方米，外城面积推测复原约12.5万平方米。壕沟和墙体周边出土有外红里黑红陶豆、宽折沿腰圈底釜等马家浜文化时期陶片标本，碳十四测年显示壕沟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

马家浜文化时期城墙的基本特征是，东北部以塔山为依托，从塔山东西两侧分别引出墙和壕沟，有内外两道墙和三条壕沟，东西两侧发现有一大一小出入口。内墙基本可分为4~6层堆筑，部分带护坡，基宽一般在4~9米之间，现高0.4~1.5米；外墙堆筑有3~6层，部分有墙体护坡，基宽6~12米，现高0.2~1米。内外墙间距在6~15米之间，墙体大多用较为纯净的黄土分层堆筑，北部墙体发现用大石块铺垫加固的现象。壕沟沟口在5~21米间，现深1.2~2米。内墙外壕与外墙内壕局部有重合。发掘的三道壕沟内堆积层次较多，从剖面结构和堆积内包含物来看，至少可分为早晚两大段，显示壕沟有长期使用的过程。

马家浜文化时期还发掘了一批墓葬、灰坑、房址和红烧土遗迹。目前已发掘马家浜文化墓葬近70座，仍有大量墓葬已确定开口尚未发掘。马家浜文化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包括成人和幼儿葬，墓向基本为北向，也有个别东向墓葬。成人墓葬以俯身直肢葬为主，随葬有红陶豆、陶纺轮、陶罐等器物，部分墓葬中见有陶豆等打碎覆盖墓主头的现象。发掘区内还发现了多处红烧土堆积，烧土堆积中见有竖立的陶缸等烧物，应该是房址类遗迹。该时期出土文物包括陶釜、陶鼎、陶豆、陶盆、石纺轮、石斧、玉块等，陶系以夹砂红陶为主，也有内黑外红陶。从陶器特征和墓葬形制来看，以上遗存属典型马家浜文化，但也可见太湖西部骆驼墩文化的因素，例如少量东向墓葬和由平底釜演化而来的陶鼎。

崧泽文化时期遗迹以墓葬为主，目前在遗址发掘区中部发现了

江苏无锡斗山遗址——首次揭示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城址



发掘区北部揭示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墙体与壕沟（上为北）

两处相对集中的墓群，已发掘墓葬160多座。墓葬方向多为南偏西，整体上东西向成排分布，多数人骨无存。一般崧泽墓葬随葬品在10件以下，较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在20件以上，显示出较明显的社会分化。出土随葬品包括玉钺、玉璜、石钺、石铙、陶鼎、陶豆、陶杯、陶大口缸等，根据器物形制判断大多为崧泽文化中晚期。

在T2016和T2017等探方中，揭示出一片崧泽文化时期较高等级的墓葬及其周边建筑遗存。墓葬与建筑遗迹的布局方向一致，均为北偏东方向。其中，个别较大

型墓葬长度超过3米，宽度约1.8米，大小规模明显大于在遗址中发现的一般崧泽文化墓葬，显示出其特殊的等级意义。建筑遗存中发现有柱洞、基槽等结构。其中，较大的柱洞直径为30~40厘米，小型柱洞则呈排状连续分布，大多数未见基槽，直径在3~5厘米之间，可能为篱笆或栅栏类等遗迹，或可能与崧泽文化墓地的界域有比较密切关系。

意义和价值

长江下游地区此前明确发现的史前城址为环太湖南部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的一些显著特征，如东北部和西南部分别依托雉山和凤山、有内外壕沟、墙基下铺垫石块等迹象，在斗山马家浜文化城址中似可找到溯源。换言之，斗山史前城址依山而建、内外壕形制、墙体局部包裹石块等筑城理念，为理解良渚古城的营造，提供了比较合理的历史渊源依据。

斗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的重要中心聚落，遗迹密集，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斗山遗址确认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城址，是目前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也是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之一，对中华文明探索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呈现“两墙三壕”形制的斗山史前城址是同时期结构最复杂、规模最大的城址，其发现为重新认识马家浜文化社会形态和生产水平，以及对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所发现的崧泽文化墓地，尤其是高等级墓葬及其特殊营造现象，为探讨长江下游地区古国时代的早期阶段，以及对良渚文化早期贵族墓地的影响与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支撑。

目前，考古队已基本确认马家浜时期内城范围，但外城形态、内外城是否同时存在、城址修筑与废弃的确切年代，以及崧泽文化遗址范围等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下一步，考古队将按照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制定中长期考古规划，加强多学科合作，从长江文明溯源的视角谋划斗山遗址的系统发掘和研究，以期全面揭示斗山遗址的内涵和价值。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上海博物馆 南京大学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葛昕炜 白倩 李文成 章灵 张雷 刘昊 温婧钰 周润垦）



斗山史前城址平面示意图



遗址东北部TG11墙和壕沟（西—东）

本版责编：郭晓蓉 张 宸

营前村北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营前村北800米处，遗址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北侧紧邻琅琊古墓（汉代封土墓，系黄岛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南侧紧邻营前遗址（龙山文化贝丘遗址，系黄岛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位于通常所认为的战国、秦汉琅琊邑（郡/县）城东南部，年代跨战国、秦、汉。

2025年3月至5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黄岛区博物馆联合，对营前村北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各类遗迹51处，包括墓葬13座、水井6口、灰沟9条等，出土铜印章、玉具剑、温明、陶罐等各类文物112件/套。现将此次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做简要介绍。

地层情况

①层为现代耕土层；②a层为秦汉时期文化层，黄褐色沙土，断续不连贯，主要位于发掘区东部汉代墓葬区，往西消失；②b层为秦汉时期文化层，黄褐色沙土夹杂少量基岩，东侧有大量红、灰色陶片、瓦片堆积，往西逐渐纯净；②c层为秦汉时期文化层，浅灰褐色沙土夹杂少量黑色淤黏土，主要位于发掘区西部地势低洼处，应为汉代时期自然淤积于此的土壤，早于东部汉代墓葬形成的时期。以下为风化基岩层。

各时期遗迹、遗物

战国时期遗迹和遗物

该时期的遗迹均为墓葬，位于发掘区东部地势较高处，共发掘战国墓葬6座，为南北向竖穴岩坑墓，均开口于耕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其中M3保存完好，从残存灰痕判断应有木棺，随葬品放置于棺西侧，主要包括陶甗、陶豆、陶壶，其余墓葬未发现随葬品。



M4出土陶罐、陶壶

秦汉时期遗迹与遗物

主要为汉代墓葬，一组手工业相关的遗存和秦汉时期水井等遗迹。

汉代墓葬 共发掘汉代墓葬7座，其中5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岩）坑墓，主要为东西向，开口于耕土层下，向下打破②a层直至生土。葬具形制主要为一棺一槨，人骨保存较差，仅存几颗牙齿。墓葬随葬品主要有陶器、漆木器、玉石器、琉璃器、铜器、铁器等。另有瓮棺葬2座，墓圻为圆角长方形，埋藏较浅，墓圻内放置1个或2个大型陶罐。

M3棺内放置微型鎏金铜车马器等随葬品；M4棺内墓主头部放置谷纹玉璧1枚、铜镜3件，漆木构件等腐朽严重只余灰迹和漆皮，根据其摆放位置推测应为温明1套，铜镜下有纺织物残留痕迹，并有玉五窍塞，墓主腰部放置铜带钩、环首铁刀、玉具剑等随葬品；M6棺内墓主腰侧放置铜印章一枚（印面锈蚀严重，待CT扫描后识读）。墓葬中出土的温明、玉具剑、印章、鎏金微型铜车马器等随葬品，等级较高，结合遗址的地理位置，推测应为汉代中期琅琊城外的一处等级较高墓地的南缘。

手工业相关遗存 在发掘区西部地势较低洼处，发现一组手工业相关遗存，该组遗存由水井、沟、成组的方坑有序排列而成，遗存的年代早于发掘区东



M4棺内墓主头部温明残存构件

部的汉代墓葬区。

沟南北向，有东西两条，相隔约5米，宽1米左右，剖面呈“U”形，两沟均开口于②c层下，应为同时期修建，沟底部堆积为黄褐色淤沙，夹杂少量泥质灰陶片。两口水井分别位于发掘区内两条沟北部，水井处在沟中，两者使用期应为同时。水井平面呈圆形，直径1.2~1.9米、残深3.5米，井内堆积较纯净，主要为浅灰褐色淤土，发现少量瓦片、陶片。方坑共17个，有序排列在沟的两侧。方坑挖建在生土（基岩）上，平面呈方形，多为斜壁平底，深浅不一，坑壁、底修筑规整，坑内多为浅灰褐色淤积土（含砂量较高），坑内基本未发现遗迹或陶片，仅西侧一处较深方坑底部发现一件陶罐和少量陶片。

水井在地势较高的沟北侧开凿，成组的方坑围绕着沟修筑，且沟、井、方坑内的堆积均为淤积土。根据这些迹象，推测此组遗迹应为一类手工业遗存，其功用或与储水、运水和用水有关，囿于发掘区内范围限制，现有迹象尚不足以使我们明确这组遗存的具体性质。

其他遗迹 本次还发掘了灰坑、沟、水井等遗迹，出土了一些陶罐、板瓦、陶片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J1井底发现“琅县”铭泥质灰陶罐、J2井底出土“琅县”铭泥质灰陶片。

J1井内发现大量瓦片堆积，主要为

河南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新发现



莲花薰炉



椭圆形隐圈足洗



饕餮纹鼎式炉

现数量较多，大小不一。浅盘口，长颈，折肩，筒状腹，圈隐足，以足端刮釉垫烧为主，少量器底支钉烧。

套盒 分为方形和圆形两型。方形套盒底径14.5厘米，高6厘米，数量较多。器身呈正方形，圆角，子母口，浅盘内斜，中部有一方形凹槽，直壁，中部微凹，上下分别有凸棱一周，按地面刮釉垫烧。圆形套盒底径12.5厘米，高4.4厘米，仅发现一件，子母口，浅盘内斜，中部有一圆形凹槽，直壁，上下分别有凸棱一周，按地面刮釉垫烧。

以上器型均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高度吻合，尤其是椭圆形圈隐足洗更是这两处窑址的标志性特有器物，目前尚未在其他窑址有过发现。此外，二者在装烧工艺与窑具使用上亦存在诸多共性，例如均采用支钉支烧技法，且都使用插片式火照等较为特殊的窑具。这些共性不仅表明两窑之间存在深度的技术交流与互动，更暗示其极有可能存在传承与接续关系，进而说明二者在窑场性质与生产年代上应颇为接近。

发现数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对应器物

经观察比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青釉饕餮纹鼎式炉、青釉贴塑尊、方壶以及撇口束颈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器物在器型和纹饰上均极为相似，很可能是以其为范本制作而成。

饕餮纹鼎式炉 口径11.2厘米，高14.8厘米。唇口，圆角长方形耳微外撇，弧腹，圈底，腹壁装饰凸出，分上下两条纹饰带，有6组锯齿状飞棱，飞棱间模印饕餮纹，云雷纹作底纹。腹下呈三个柱形足，足上贴兽面纹。足端刮釉垫烧。此鼎式炉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周圆腹簠簋”如出一辙。

贴塑瓷尊 口径6.8厘米，底径9.4厘米，高20.5厘米。直口微敞，长颈，垂腹，圈足微外撇，肩部有两个环状兽形耳。器身满布贴塑纹饰，颈部饰山形纹，腹部饰盘综交错的夔龙纹，圈足饰海水纹。足端刮釉垫烧。此尊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周高克尊”非常相似，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亦收录有此器（书中名为朝事后中尊），并有“此尊环颈饰以山而腹文若龙蛇相蟠纠”的描述，图文皆与出土瓷尊对应。

方壶 口径8厘米，底径8.3厘米，高

21厘米。方形口，窄折沿，直颈，丰肩，壶身呈方形，上腹部饰一对铺首衔环做系，系呈方形，下腹斜收，圈足外撇。此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汉兽耳方壶”相对应。

撇口束颈壶 口径8厘米，底径7.4厘米，高15.8厘米。撇口，颈微束，腹部微鼓，圈足略撇，足端刮釉垫烧。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中的“商立父辛解”在器型上非常相似，区别仅为瓷壶器身素面无弦纹。

综合上述对比可见，张公巷窑址的部分礼器产品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之间确有“依样仿制”的关联。尽管青瓷贴塑尊的原型亦见于吕大临《考古图》，但该书并未同时收录饕餮纹鼎式炉及其他同类礼器的相似形制；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无文献记载表明《考古图》等著述曾被用作礼制规范的参考。因此，《考古图》等不应是张公巷窑址制作礼器时的参照依据。由此可推断，张公巷窑址的礼器当以《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为范本制作，故其烧造时间应晚于该图录修成。进一步而言，此图录由宋徽宗亲自敕令编撰，以这类官方审定的图样为标准烧造器物的窑场，其性质显然非同寻常。

发现带有明显道教元素器物

张公巷窑址出土器物整体以素面为主，装饰较少，但依然发现装饰有八卦和五行等明显道教元素的器物。

八卦纹鼎式炉 口径14厘米，高15.4厘米。子母口，长方形耳，弧腹，圈底，外腹壁装饰凸起八卦图案，近底部纹饰不明，底面外沿接空心蹄形兽首足，内侧有一小孔，三爪外撇着地。足端刮釉垫烧。

五行器盖 口径10.4~12.7厘米，高4.8~5.7厘米。圆形，双兽首形提梁，盖面微弧，镂空刻“金木水土火”大篆字体。有盖端刮釉一周垫烧和盖内支钉支烧两种烧造方式。

这两件器物反映出，张公巷窑址的部分产品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而佛教等其他宗教元素在其产品中并无显著体现。结合前文关于该窑场可能具有供御性质的推论，这种宗教取向的差异，很可能是当朝宗教政策、时代背景或统治者个人偏好的直接反映——这一特

建筑用的素面、绳纹板瓦、筒瓦等，并底出土“琅县”铭泥质灰陶罐，“琅县”铭文位于陶罐外壁近底处；J2井底出土“琅县”铭泥质灰陶片，铭文位置、字形与J1出土铭文基本一致。“琅县”铭为半通印戳印而成，未发现边框和界栏，字体为小篆，字形特征与已知秦玺印文字一致，印章形制亦见于以往发现的秦玺印。见于著录而与琅琊有关的玺印类文物，秦玺印有“琅左盐丞”，秦汉封泥有“琅邪司马”“琅邪司空”“琅邪司徒”“琅邪左盐”“琅口右口”“琅邪都水”“琅邪水丞”“琅邪侯印”“琅邪發弩”“琅邪县丞”等。《汉书·地理志》：“琅邪郡，秦置。……县五十一：……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一统志》：“（琅邪）故城在诸城县东南百五十里，琅琊山下。”我们认为，此次发现的“琅县”戳印铭，应为“琅邪县”的省称。

从发掘情况看，结合发掘区所在位置，推测发掘区位于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郡/县）城东南部。发掘区东侧，地势较高，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区；发掘区西侧，因地势低矮，长期有流水或积水，故被辟为手工业生产区。发掘区位置特殊，年代跨越战国—秦汉这一剧烈转变的历史时期，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郡/县）的更迭延续、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琅县”铭文的发现，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琊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印证了文献记载，并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窑址等遗存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琊地区设置郡县，巡狩东方，进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黄岛区博物馆 执笔：吕雅婷 于焱赞 李晓涵 李祖敏 慕高华 彭岭）

宋代徐兢出使高丽时的新窑器



征与北宋末年的社会语境更为契合，或可成为推断其年代的又一重要线索。

发现宋代徐兢出使高丽时的新窑器

北宋出使高丽使臣徐兢在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高丽青瓷釉色时将其与越窑和汝州青瓷器对比，“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在汝州张公巷窑窑址中出土一件饕餮纹鼎式炉，和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高丽青瓷鼎形香炉极为相似。这件饕餮纹鼎式炉目前仅在汝州张公巷窑窑址出土，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还没有发现过。高丽青瓷中的鼎形香炉造型源自河南汝州张公巷窑窑器的可能性很大，汝州张公巷窑窑址有可能就是文献里记载的汝州新窑窑窑址。

张公巷窑窑址自发现以来便持续引发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精工细作的生产技艺，以及所产器物与清凉寺汝窑、南宋官窑等窑场器物的高度相似性，使其“官方窑场”的属性得到确凿认定。然而，关于该窑址的年代问题，仍讨论热烈。

本文立足于张公巷窑窑址灰坑H813和H833出土的新器型，从四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与清凉寺汝窑器物的对比研究，二是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记载的对比，三是对器物自身纹饰风格的剖析，四是特殊器型对其他窑口的影响，旨在为张公巷窑址的年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实证依据。其中，器物与文献记载的呼应发现尤为关键。基于二者的高度相似性，可推测张公巷窑址（更准确地说，是该窑址所产的这批仿青铜瓷礼器）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存在“依图样制”的关联，即其生产时间应晚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修成。这一推断对于精确和细化该窑址的烧造年代具有重要意义，而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同型的仿青铜瓷器，更可作为千年前礼制复兴与复古之风盛行的实物见证。期望本次整理的新发现，能为张公巷窑址的年代考证与性质辨析提供更具启发性的实物资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故宫博物院 北京大学文物局 执笔：赵文军 王孟珂 李崇武 杨玉华 李艳萍 武玉波；摄影：王蔚波）